

國共內戰時期

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編

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上冊

文壇頗為熱鬧，本地作家與
本書搜集了當時的文學代表
前香港文學創作風貌。

同文學體裁：新詩、散文、
小說、戲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及評論，風格續
紛，內容豐富。

有關這時期作品的一般情況、背景及作品特色，
三位編者在對談中作出詳盡深入的討論，深具參考作
用。

ISBN 962 950 686 6



9 789629 506865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上下兩冊H.K.\$100.00

上冊

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編



本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書中言論並不代表該局立場

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 (上冊)

編者：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翠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九年·香港

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

鄭樹森：鄭 黃繼持：黃 盧瑋鑾：盧

（一）編選報告

（二）戰後初期一般情況

（三）南來文人的背景及活動

（四）南來文人與本地文壇互動

（五）本時期作品特色

5 · 1 新詩

5 · 2 散文

5 · 3 小說

5 · 4 戲劇

5 · 5 報告文學

5 · 6 兒童文學

5 · 7 評論

(六) 小結

(一) 編選報告

鄭：首先談國共內戰的上下限問題。現在把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定為國共內戰時期，為中、英文重要專論的上下限。在中文專論裏，徐中約、魏宏運都以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為國共內戰的上下限。在英文專論裏，Lionel M. Chassin, John Melby, Suzanne Pepper 等亦然。至於 Rabin Vohra 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及 Conrad Schirokauer 作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屬特例。此外，撰寫過多種敘述性中國現代史的費正清 (John Fairbank) 及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也從眾，採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之說。費、史兩人著作特別風行，各有兩本敘述性的中國現代史通論，都以此作為上下限。就內戰上下限的界定，我們也請教過專研汪精衛及國民黨黨史的王克文教授，他也支持採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即自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前後，是目前史學界通用的上下限。因此，我們在過濾及選取材料時，是以這個上下限為標準。

黃：我們這次所選取的作品出版時期，是從香港光復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前後，即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九年底。嚴格來說，國共內戰實際上是由一九四六年夏天蔣介石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開始的。日本投降後的一年間，國共兩黨還作過若干程度的和談及商議，一九四五年的「雙十協定」曾帶來了和平的希望。可是兩黨其實各自進行軍事部署，到明年東北問題和平解決不了，國共全面內戰便不可挽回了。因此，如以嚴格的軍事衝突來界定，國共內戰是從一九四六年夏天至

一九四九年底，而學術界則有人把肇始時期上溯至一九四五年乃至抗戰期間，認為其來有自。

鄭：根據中共方面的看法，他們認為談判也是鬥爭的一種，和談也是戰爭的一種，所以史學界視抗戰勝利後及各種談判為雙方衝突的前奏，事實上雙方都打算作全面的軍事衝突，但仍各自在衡量行動的時機。

黃：在軍事衝突前，宣傳陣地、文化陣地一早已開始角力。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已致電中共廣東區委，指示立即派遣幹部前往香港廣州，佔領宣傳陣地。原東江縱隊《前進報》社長楊奇，率六名記者趕赴香港。

盧：一九四五年九月，饒彰風也已來港。

黃：同年十一月，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正報》在港創刊，楊奇任社長。十二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成立。佔領香港宣傳陣地，早在內戰爆發前便已見端倪。到軍事衝突正式開始，加上幾次局勢動蕩，大批文化人南來香港，形成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的文學藝術活動突然蓬勃。我們本集選取的作品，也可視為當時內戰在文學上的配合和反應，標題中的「國共內戰時期」可作如是解釋。至於本地文人，即使他們的聲音被南來文人所壓倒，但並非聲息全無，仍有些成就較顯著的作家如侶倫、柳木下等。

鄭：對於「南來文人」的定義，是否指在內地南移香港的中國大陸文化人及作家？

黃：對。我們用「文人」一詞是採廣義的用法。

鄭：所選取的作品是否一定要在居港時寫作？在香港報刊上發表？

盧：不，也有例外的情況，如丁景唐的作品便發表於上海。

黃：主要是在香港發表，間有少數與香港文學發展有密切關係的文章，我們也會斟酌選收，或作為附錄，以作背景材料。如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不在香港寫作，但在港發表，而且發表時郭沫若也身在香港。

鄭：總括來說，我們這次選取的作品，大體上是作家居港時所寫，在香港報刊發表，個別作家的作品則可能在其他地方寫作，然後在港發表。

盧、黃：對。

黃：關於編選原則，我們這本選集以南來文人及本地文人的作品為選取的材料。當時有不少內地作家南來，我們收錄他們的作品，要有所別擇，因為有些人雖然曾經來港，但來港的確實日期並不容易推定，而且有些作品未必在港撰寫，只是人到香港以後才發表。這段時期許多文章並不一定屬於嚴格意義的文藝作品，許多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散文及雜文，當中不一定有多少藝術性。這自然與當時香港的社會處境與政治空氣有關，國共都利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所以留給香港本地文化人的空間並不多。我們希望盡量選取一些文藝色彩較濃，且與本地關係較為密切的作品。小說及散文，我們多選以香港為背景的，也有以廣東地區為背景。這是我們選取的重點。再有小部分以上海為背景，如柯靈的小說，發表時柯靈已來港，所以我們選入作為例子。其他作家還有類似的情況，但我們則選錄不多。遲些談到本地特色時，我們會再評述。

盧：我想談談在編選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第一是這時期的出版物眾多，包括報紙副刊、以叢書形式出

現的刊物、各種以單期形式而實際上有系列性的作品等，這些眾多的出版資料，除了少數以外，其他的出版時期都很短，有時出版一兩期便更改名字，因此整理時便發現很多混亂的地方，特別是它們的名字。例如《野草》出版了一段時間，就以各有獨立名字的叢書形式出現。第二：由於當年因人手變動、時局不穩等原因，刊物出版得很匆忙，有些期號很凌亂。第三：這些短期以文藝形式出版的刊物，編者多不曾作系統說明，所以其背景、起始便成為我們的「缺門」。第四：這時期出版的書刊每期印數不多，銷路也窄，至今能見的不全，我們不想只靠手頭所有的書籍或期刊，作為研究該社團或社群的全部面貌。第五：作者的筆名眾多，也造成研究困難。這時候可能因為政治關係，也可能因為一個人寫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個名字發表，所以一版之內的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有些甚至連作者自己也忘記了，例如：端木蕻良曾用過很多筆名，他在晚年忽然想起，才告訴我們。為了統一計，我們即使知道某個筆名屬誰，也不會標示出來，這是為了避免掛一漏萬，影響日後的研究者，混淆他們的視聽。第六：報紙的欠缺。我們所選的作品常輯錄自報刊，但許多報紙是不齊全的，我們只能參考圖書館館藏或個人所有，例如：我們要研究「文協港粵分會」的活動，便要參考他們出版的《文協週刊》，但《文協週刊》有段時期刊登在《人民報》，我們找不到《人民報》，這部分便只能從闕，要待日後的研究者再作補訂。

（二）戰後初期一般情況

鄭：從現有資料來看，當時香港與內地比較，似乎較沒有重大的破壞，被囚英人亦在被釋後立即視事，故復元較快。根據我們選取及過濾掉的（沒有選取的）一些文章來看，市面情況較快就回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人口約有五十萬，仍是華洋雜處；不久灣仔、石塘咀等洋華風月地也「歌舞升平」。

盧：其實並不快，香港經濟的困乏，維持了一個時期。貧富懸殊，成為南來文人的寫作題材。

鄭：從一些未入選的雜文和散文，都可看到這兩個地點似乎很快便回復到戰前的情況。在文化界方面，《星島》、《華僑》等老報紙很快便繼續出刊，仍保持副刊版面，不少在報上發表作品的作家在淪陷時期也居住在香港，如葉靈鳳、戴望舒、黎明起、陳君葆。另外一些具有香港特色的小報也紛紛創刊，例如只有一小張的黃色報、《伶星報》等，後來被南來文人嘲笑為「嫖妓」報。這情況似乎與三十年代差不多，至此香港文人及文壇又以作品發表的地點呈現出雅俗兩極、涇渭分明的局面。在戰後初期，最早來港佔領文化陣地的是因利成便的國民黨海外部辦的《國民日報》，這份報章很快便復刊，較有中國黨政色彩，但《國民日報》的副刊並不出色，只關心文化漢奸問題。隨著國民黨文化人如胡春冰等來港，戰後最初期是右派力量，以當時盟國、盟軍姿態出現而較為趾高氣揚，其「高姿態」遠超三十年代。

盧：姿態高但卻沒有實際表現。

鄭：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部門都有各種代表來港，表面上是宣慰同胞，實際上則是試圖重建、開拓在港力量。抗戰勝利後香港的主權收回問題極為英人關注。例如蔣中正要求香港列為中國戰區，由重慶派代表受降，英國堅拒，自新加坡火速派夏愨率艦來港受降。最後在中方堅持下，變成雙方皆

有代表，但仍由英人受降為主，因此英國人自經這番主權爭執之後，對國民黨勢力在港發展也很重視，後來「文化漢奸」問題便趁機找個藉口打擊《國民日報》，勒令停刊一段時間，實為對中國提出主權問題之「下馬威」。這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勒令解散「教師福利會」及「達德學院」等，來打擊左派教育界的組織力量，以為警告，道理上是一樣的。港英政府的做法總是針對中國的，一九四五年針對《國民日報》，因為當時國民黨勢力最大，且是戰時的盟國。一九四九年中國政權移易，國民黨完全垮台，港英政府便倒過來針對左派。因此，港英政府到底針對左派還是右派，一直以來都是要看英國在遠東及香港的實際利益來決定。可以說，英國人其實是没有政治原則的，作為盟友的國民黨也一樣不放過；到一九四九年後又打擊左派，同時卻為了延緩中國收回香港而向北京示好，在冷戰時期是西方第一個承認北京新政府的反共國家。換言之，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只想保護殖民地的利益，而無甚政治大原則可言。

盧：剛才你說的背景非常重要，但有幾點我仍想補充一下。第一是到抗戰勝利後，除了英國人很快回復社會秩序以外，左右兩派的文化人可說是重演一次戰前的角力場景。戰前國民黨的文化人還有較完整的目標與組織，但戰後最初期來香港的國民黨文化官，可說是游兵散卒，面對香港的文化宣傳，可謂完全没有原則，如派軍部的人來做宣傳工作，其號召力及吸納能力都不足夠，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而左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便立刻派大將饒彰風全力在香港編報紙，並組織在內戰時期南方文化人的宣傳隊，如「中原劇藝社」等成員也來港，而饒彰風、潘漢年更派人滲入廣播機構，可見左右的強弱之勢早已清楚分明。第二，剛才提到經濟很快復元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我們確在報章及作

品內看到很繁盛的社區經濟狀態，實際上香港在這時期仍然元氣未復，所以經濟仍很困乏。正因為經濟困乏，所以才令共產黨很容易在工人階級及教育界發展其宣傳勢力及組織。工人罷工、小販問題、貧窮家庭的生活方式等，我們都會在作品中看到，這些問題很容易造成社會動蕩，並成為港英政府的隱憂。因此，政府迅速更改各種法例；例如公安法、人口登記條例、反罷工條例、教育條例等。一切爲了保護治權的行動，毫不鬆懈。這些可在葛量洪的回憶錄及英國政治檔案中找到有力證據。南來文化人當中，有左派也有右派，香港文化人這時有甚麼聲音呢？英國人先辦了「中英學會」，活動只在高層華人與英人的叙會。馬文輝在其中，才起了一些微妙作用。例如請港督去看《白毛女》演出。

黃：當時左派的力量似乎比右派大，可能是由於國民黨宣傳人員無能，也可能與港英政府微妙的策略和傾向有關。三十年代報紙開天窗不時出現，戰後不見了，卻出現被罰停刊的情況。當時的港英審查政策是否改變了？而這個改變客觀上是否有利於左派，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鄭：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我們目前看不到過去處理《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兩書時大量的開天窗及全篇文章抽檢的情況。反而看到港英政府以「下馬威」形式的罰停刊或取消團體註冊資格的現象，所以從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有利於共方及左派的宣傳工作。至於國民黨在文化界的組織及力量，明顯是很鬆散的，雖然各個部門都有派員來港，但卻沒有完整的組織及統籌活動，比不上共方有數員大將在港全力指揮及統籌。

黃：左翼的文藝工作是全國配合的，華南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因此，內地多項文學論爭及政策趨向往

往在香港出現，有部分則加上香港本地色彩。不一定與香港本土的文學發展有密切關係，卻可視為整體中國文學其中一個特殊而帶地方色彩的部分。

鄭：同時左派也利用了香港的轉口港之便，展開對台灣的初步工作，香港過去在二、三十年代與上海的來往較為密切，後來則成為到台灣或南方（如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等）的橋樑，可見香港又再一次扮演了轉運的中介特色。

（三）南來文人的背景及活動

鄭：我們先討論內地文人何以南來這個問題。在抗戰勝利前夕，蔣中正曾訓令外交部，利用日人侵華、各租界因被佔據而名存實亡之局面，將租界問題在抗戰勝利後一舉解決。因為香港不是租界，所以收回問題較複雜。蔣中正向英人提出時，邱吉爾大為光火，並請羅斯福總統支持其不交還立場。其時大戰未結束，蔣不得已將香港問題擱置。這樣一來，在國共內戰白熱化時，不少左派文人都沒有租界可以藏身，以避開國民黨特務的干擾、拘捕。後來又有聞一多、李公樸的被刺殺，因此左派文人的的人身安全也成為問題（胡風來港的日記就提到這一點）；這就和三十年代不同。左派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時期裏再沒有租界可以庇護，香港成為最後、唯一的避難所。但當然，來港是不得已，故來港後仍北望中原、心繫故國，日夕對中原「喊話」。至於南來文人的背景，他們都以香港為避難所，包括黨員作家、長期以來靠左的文人、較不核心的民主派同路人。由於廣義左派文化人

的背景不完全一樣，對文藝的看法也不一致，因此有些人較為激烈（用今天的說法則是極左），如林默涵，有些就較溫和，如柯靈。因此，在廣義的左派多達三、四百人的情況下，意氣之爭在所難免。由於有些人特別左傾，所以批胡風和路翎的第一炮在港發出，自不為奇。差不多同一時間，陳殘雲也就《風砂的城》正式發表文章自我檢討。

盧：甚至連豐子愷來港辦畫展也給人批判，有兩篇文章說他的作品沒有戰鬥性。當時大部分左派文人來港都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這一點與抗戰時期來港的部分文人相同，如：茅盾、夏衍等。只是抗戰時他們的目標是統一戰綫抗日，而這一次則把焦點集中打擊國民黨及支持共產黨這個問題上。至於剛才提到大部分南來文人均屬左派，這要說得清楚點。當時局勢動蕩，知識份子都盼望為中國未來尋出路。許多人對國民黨失望，而國共兩黨正在鬥爭中，他們既不滿右派，自然會傾向左派。許多數的民主派都在猶豫，既然國民黨迫得他們走投無路，只能在香港暫抱觀望的態度，很容易便會與左派靠攏，這並不表示他們就屬於左派。

鄭：這也是廣義的左派，因為他們是不贊成、不支持國民黨的。這裏有最核心的成員，是由中共派來的南方局的成員，再有一些長期以來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員，最後就是他們要拉攏的外圍民主人士，而這些民主人士在一九四九年後也多被招降。換言之，這是一個廣義的「左翼聯盟」(Left wing coalition)。

盧：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必須小心處理，就是很難確定那些作家甚麼時候在香港，甚麼時候在廣州。當時港穗兩地文化人往來頻密，造成香港和大陸的密切聯繫。如《人民報》在香港創刊，但不

久便搬回廣州；《華商報》更支援廣州報館的被毀等。又如初時戴望舒在港辦「文協」通訊處，不久就成爲「文協港粵分會」，兩地文化人都參與。到後來才兩地分清楚，改稱作「香港分會」，可見他們的關係可以隨時互動。

鄭：他們來港人數多，但卻沒有甚麼特殊工作，最早多投入編輯、出版、辦刊物、寫作等文學活動。
盧：如上海的徐鑄成便奉命來港佔領出版報章的宣傳陣地。

鄭：由於人數衆多，發表出版增多，一時間令香港的文壇表面上非常熱鬧，一反戰後初期狀態。

盧：像抗戰期間一樣，他們來港以後，除了自己辦刊物外，還可滲入《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我們在編選作品時是沒有偏見的，但所選作品卻大部分屬於他們，就是這個道理。

鄭：他們除了大量投稿到《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以外，自己辦的報紙主要有《華商報》、《正報》、港版《文匯報》等。

盧：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他們在報章上辦許多不同類型的週刊或雙週刊。例如《文匯報》的《文藝週刊》（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創刊）、《星島日報》的《文藝》（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創刊），特別是《星島日報》所辦的《音樂》、《戲劇》、《木刻》、《讀書與出版》、《民風》，真是多樣化。

鄭：他們也有辦雜誌，除正式雜誌外，刊物還有以叢刊方式，每輯有個別名稱的較不定期雜誌，如：《中國詩壇》、《野草文叢》、《學習叢書》等。

盧：這是戰略的需要。

黃：雜誌還回流至內地。

鄭：還有一些南來後新辦的書店，如「生活書店」、「民主書店」、「新知書店」、「初步書店」等。但這個比較純粹文學的狀況只維持了一個短時期。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後，南來文人的活動日益政治化，根本可形容為文學工作者全力投入政治活動。以一九四八年為例，各種發表聯合抗議宣言的政治活動極為頻密，這從《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香港文學資料選》上的年表就可以看到。

盧：除了辦刊物外，他們還會辦出版社，例如「人間書屋」、「新民主出版社」。又會辦學及舉辦演講會。辦學包括「達德學院」、「南方學院」、「持恆函授學校」、「新聞學院」等，這對香港文化發展有實質影響。因為這些學校容納了很多年輕的、失學的、流落在香港的內地青年及本地人。他們雖然有政治目的，但那種從教育出發，提供就學機會的工作方向，對香港社會各階層都有深遠影響。

鄭：這一點我也很同意。有些組織後來對香港還有間斷的、不同的影響。如「香港青年記者學會」主辦的「香港新聞學院」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復校，培養了一批記者，後來多在左派港報工作。許多作家如茅盾、陳殘雲、蕭乾、卞之琳等都到此演講，也培養了一些文藝界人才。又如「中原劇藝社」（一九四六年），演出了不少左派作家戲劇，推動了香港的劇運，同時也培養了一批本地青年，在五十年代進入左派影劇界。例如當時經常上演的劇目——周彥編劇的《朱門怨》，是「中原劇藝社」在香港太平戲院首演的。此外，「達德學院」也於一九四六年創辦和招生，培養了一批熱情、